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编辑思想发展史

(中卷)

吴平 钱荣贵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武汉大学出版社

- 责任编辑 / 胡程立
- 责任校对 / 汪欣怡
- 版式设计 / 马 佳
- 封面设计 / 罗 兀

ISBN 978-7-307-11767-9



定价: 160.00元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中国编辑思想发展史

(中卷)

吴平 钱荣贵 主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中国编辑思想发展史》（上、中、下卷）

撰稿人名单

总 论		吴 平
第一章	第二章	钱荣贵
第三章		段乐川
第四章		芦珊珊
第五章		李 乐
第六章		徐 媛
第七章	第八章	胡程立
第九章	第十章	向 敏

目 录

中卷：隋唐五代、宋元

第四章 隋唐五代的编辑思想·····	411
第一节 隋唐五代经学作品的编辑思想	
——从追求统一逐渐向注重义理过渡·····	411
一、统一思想的先导——《经典释文》兼容并包的编辑思想·····	412
二、唐初经学对统一的追求——《五经正义》的编辑思想·····	415
三、中晚唐新起《春秋》学代表人陆淳的编辑思想·····	421
第二节 史籍编修以“实”为宗·····	436
一、实录直书的编辑原则·····	436
二、实用于政的编辑宗旨·····	444
第三节 类书与佛教典籍的编辑思想·····	469
一、类书编纂思想的发展状况·····	469
二、佛教典籍编辑思想·····	488
第四节 别集和总集的编辑思想·····	501

一、浓厚的立言传世意识——别集编辑思想	503
二、编以言志——总集编辑思想	511
第五章 宋代的编辑思想	536
第一节 宋代编辑出版的社会背景	536
一、统治者的重视促进了编辑出版发展	536
二、造纸术的进步降低了编辑出版成本	537
三、印刷技术的革新提高了编辑效率	538
四、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编辑出版规范化	539
第二节 “经世致用”的编辑出版宗旨	540
一、统治者以书籍编辑稳定统治	541
二、司马光以《资治通鉴》达到资政目的	548
三、政治资鉴宗旨的充分发扬	552
四、朱熹编辑书籍以建立理学	555
五、私修类书实现学以致用	556
六、文集使优秀作品传之后世	558
七、对宋代经世致用编辑宗旨的评价	560
第三节 宋代“经书”的编撰思想	562
一、朱熹提倡的“惟本文本意是求”注释原则	563
二、朱熹注释过程表现出的“以己意说道理”	566
三、在其他经注书籍中体现出的“以己意说道理”	569
四、两种相悖思想作用下的文本审读	574
第四节 宋代史书与类书的编辑思想	583
一、丰富完备的史书	583
二、靡所不载的类书	585
三、郑樵总结资料收编的“会通”原则	587
四、“会通”思想指导下的资料收集	591
五、“会通”思想指导下的资料选择	601
六、“会通”思想指导下的体例设计	615
第五节 编辑主体意识的明确与编辑活动职业化	628
一、编辑主体意识概念辨析	628

二、编辑主体意识的表现特征	629
三、宋代的编辑主体意识和编辑职业化	630
四、职业编辑陈起	638
五、专业编辑朱熹	647
第六章 元代的编辑思想	660
第一节 元代编辑活动的社会基础	660
一、蒙汉二元性的政治环境	661
二、“汉法”与“国俗”交融的经济体制	663
三、两重性的文化政策	664
四、科学技术延续辉煌	666
五、多元并存的宗教环境	667
第二节 元代经部书籍编辑思想	668
一、元代经学著述编撰考略	669
二、元代经学家的编撰思想	674
三、元代经部书籍编辑思想的启示	698
第三节 元代史书编辑思想	699
一、元代史书编撰考略	701
二、元代史学家的编撰思想	710
三、元代史书编辑思想的启示	728
第四节 元代子部书籍编辑思想	729
一、元代农书的编辑思想	730
二、元代小说的编辑思想	749
三、元代子部书籍编撰思想的启示	757
第五节 元人文集编辑思想	758
一、元人别集的编辑思想	759
二、元人总集的编辑思想	772
三、元人文集编辑思想的启示	782

第四章

隋唐五代的编辑思想

隋唐五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对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发展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这三个多世纪里，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获得了空前发展。编辑活动是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产生的许多优秀编辑家和编辑作品以及闪耀其上的编辑思想是隋唐五代编辑事业繁荣的重要标志。

第一节 隋唐五代经学作品的编辑思想 ——从追求统一逐渐向注重义理过渡

隋唐的经学上承魏晋南北朝，兼有汉儒余风，初期仍为义疏之学，汉注唐疏，为后世释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这一时期的经学又下启宋明理学，是宋儒的先声，后期逐渐倾向于道统说，开始追求对义理的把握，对精神实质的理解。“刘炫所代表的是传经之儒，显示了笺注训诂章句疏释的经典知识与理解，可以说是儒学的‘学统’。而王通则跳过了马郑诸儒，直接讲周公孔子、谈六经、

论王道,开启了儒家的‘道统’”^①,由北朝大儒王通开始,汉儒和宋儒的差异出现了。王通在普世皆为经义章句之学的时代所开启的学道之学,对中唐以降的经学发展,影响深远。中唐以后,以新起的《春秋》之学为先导和代表,经学的发展呈现出新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融合了释道二家的思想精华。因此,经学在隋唐虽然没有取得独尊的地位,却获得了重要的转变和发展。

一、统一思想的先导——《经典释文》兼容并包的编辑思想

《经典释文》是一本解释儒家经典文字音义的书,该书具体的成书年月已无法考证。而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序》所言,其书的编撰源起在于“职司其忧”,可见是与其所任职务有密切关系的。史载,陆德明在陈与隋都曾为过学官之职——国子助教。《尚书音义》道:“沔,陆浑、沔池二县,属河南郡。”又据《通典》记载,河南郡“后汉魏晋称河南尹或司州,北魏仍之,北齐至隋文帝时称洛州,大业初废州称郡”^②,可见河南郡之称到大业初年才有,类似佐证在原书中还有不少。因此,此书当成于陆德明在隋朝为学官之时,是隋代的编辑成果之一。这部书可以算作距离唐代官方《五经》及其义训编撰时间最近的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经书。它是唐代官修《五经正义》的先导,为《五经正义》最终一统天下经学和思想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给后人研究文字、音韵及经籍版本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该书并没有像《五经正义》一样有着明显的追求统一之思想,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兼容并包的编辑思想,带有一种总括的性质,为《五经正义》的到来做着充分的准备。

(一)古今并录,示传一家之学

《经典释文》的编者陆德明(约550—630年),初授学于陈朝国子博士周弘正,少时就有很深的儒学造诣,“陈大建中,太子征四方名儒,讲于承先殿。德明年始弱冠,往参焉。国子祭酒徐克开

① 龚鹏程:《唐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3页。

② 杜佑:《通典》,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8页。

讲，恃贵纵辨，众莫敢当；德明独与抗对，合朝赏叹。”^①他这种坚实的儒学功底为他最后成为一代大儒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经典释文》的编撰提供了学术根基。他在《经典释文》的自序中写道：“癸卯之岁，承之上庠，因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古今并录，经注毕详，训义兼辨，示传一家之学。”^②

《经典释文》中的古今并录首先就体现在对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兼收并蓄的风格上。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这两个学派从汉代产生之日起就斗争不断。秦始皇焚书期间，六经与诸子都在其列，民间一些儒生冒险将秦代以前用古文字“篆书”记载的儒家经书藏起来，到西汉相继被发现。汉代学者传习的经书是今文经，由汉初的老儒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默诵下来后用“隶书”（今文）写就。基于此，以文字训诂、名物考证为根本就成了古文经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说，古文经学的核心是文字学。《经典释文》的编撰从基本立场上是遵照古文经学的方法，把释经的重点放在经字的音义训诂上，对编者认为有疑难的字一一作了音义和训释。陆德明的过人之处则在于他没有被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派别之争所禁锢，而是综合运用了两者的学术思想。他像古文经学家那样注重经书的文字训诂，但不局限于古文经学家尊崇的经注。陆德明生活的时期跨越了陈、隋和唐三个朝代，正是南北儒学在彼此的交流融合中逐渐走向统一的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他的学术传统既具有南朝的风格，同时也兼有了北方儒学的长处。《经典释文》就是陆德明学术上使这两种风格交融的体现。在对《周易》《尚书》《左传》三部经典注释的材料选择上，他遵从南方经学的传统，分别以今文经学推崇的王弼注、孔安国注和杜预注为本。故而皮锡瑞称其书“为唐人义疏之先声”^③。与此同时，他详考经字音义，注重章句训诂，遵守东汉古文经学的家法，是北方经学的特点。

①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 1975 年版，第 4945 页。

② 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 页。

③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07 页。

古今并录还体现为对古今文字音训变迁的重视,古今同尊。在他看来:“汉魏迄今,遗文可见,或专出己意,或祖述旧音,各师成心,制作如面,加以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是非信其所闻,轻重因其所习,后学钻仰,罕逢指要。”^①文字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的推移,门派的分立和地域的差别,往往使得后世学者无所适从,“罕逢指要”,直接导致了古代圣贤的思想不能为今天的学者正确而深刻地领悟。因此在编撰过程中,他充分借鉴了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访异同,校之苍雅”,将他认为有必要重点解释的字音和字义详加考证。在处理古今文字音义差别的过程中,他采用了“若典籍常用,会理合时,使即遵承,标之于首。其音堪互用,义可并行,或字有多音,众家别读,苟有所取,靡不毕书,各题姓氏,以相甄别”^②的取舍方法,一反经学尊古的传统,古今同尊。在“会理合时”思想的指导下,既引《说文解字》等古文字书进行正音,又不完全信从《说文》,甚而“有以俗字为正文,而以正体为附注者”。这种被后人称作“意在随时,不取俗俗”的行为对唐人经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二)遍及群经,兼通释老之道

《陈书》本传记载陆德明“通五经,兼释老”。陆德明精通经学,是正统的儒学家,这是不争的事实,但他同时也以博大的胸怀接受了魏晋以来的玄学和佛学的思想精髓,既推崇儒家的礼治仁政,也向往道家的清虚自守。这种政治理想和人生哲学,既表现在他的作品中,也体现在他对仕途的态度上。他一生经历了陈、隋、唐三个朝代,因为学术上的名声而受到当权者的礼遇,但并不热衷政治上的钻研,没有儒家那种积极入世、兼济民生的情怀,而是醉心于学术上的追求,满足于道德的自守和心灵的清静。他一生远离政治是非,却又不失儒者的凛然之气。史载:“王世充僭号,封其子为汉王,署德明为师,就其家,将行束脩之礼。德明耻之,因服巴豆散,卧东壁下。王世充子入,跪床前,对之遗痢,竟不与语。遂移

① 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页。

② 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2页。

病于成皋，杜绝人事。”^①在权势面前，陆德明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和功名去捍卫尊严，体现了让人钦佩的气节。

《经典释文》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也体现了他不拘儒术的学术追求。全书共30卷，卷一为序录，包括“序”、“条例”、“次第”、“注解传述人”和“目录”5个部分，分别介绍著书的缘由、全书体例、内容安排的次序及其理由，以及各种经典的师承源流和各家传注的情况。卷二至卷三十依次选择了《周易》、《古文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等14部古籍考证字音。后人称作“十三经”的，除了《孟子》以外都被陆德明收入其中。书中收集了汉魏六朝以来230余家的注经之作，加以辨析斟酌，他在经学上的博通可见一斑。书名中的“经典”二字自古以来就被认做是专指儒家经典的，而该书收录的《老子》及《庄子》却属于道家著作。他把老、庄的著作与儒家经典并列在一起，表明了他在编撰《经典释文》的时候确实有一种兼通释老、儒道兼综的思想。在他看来，儒道之间是有共通之处的。他在《经典释文·序录》中评论《老子》思想：“道家者流，清应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人君南面之术。”认为道家思想对君王统治是有帮助的。郭象注《庄子》把庄子齐物、逍遥、返归自然的思想与儒家的治国策略和伦理纲常联系起来，提出“名教即自然”的口号，陆德明深为嘉许，认为该注“特会庄生之旨”。

这种兼容并包的编辑思想让《经典释文》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清人卢文昭在重刻《经典释文》的序言中说：“此书辟经训之菑畚，导后人以途径，洗专己守残之陋，汇博学详说之资，先儒之精蕴赖以留，俗本讹文赖以正，实天地间不可无之书也。”评价实在是高。兼容并包的思想同时还孕育着统一思想的萌芽。

二、唐初经学对统一的追求——《五经正义》的编辑思想

《五经正义》包括《毛诗正义》《尚书正义》《周易正义》《礼记正

^①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5页。

义》《春秋正义》五个部分,是自汉以来对五大儒学元典注疏的总结和整理。追求统一,是《五经正义》编撰过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指导思想。

(一) 经学统一应时而生

上文提到,儒学在唐代统治者的安邦伟业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此一时期儒学的整体面貌却不那么令人满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长期的分裂,致使南北儒学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西晋南迁,大批士子纷纷随之南下,南朝成为文化的中心,儒学的发展受玄学影响较大,因而注重思辨性;而北方由于是少数民族政权,文化底蕴不如南方深厚,儒学则固守汉儒传统。又据《隋书·儒林传序》记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①南北经学异辙明显。

到唐局面稳定之后,政府组织修订梳理五经,并颁行天下,意在统一南北儒学,使学者有所依从。据《旧唐书·颜师古传》记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书成之后,“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师古辄引晋、宋已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于是……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②。对于经书的考订在前代已有先例,最著名的一次是在汉代。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政府立石将重要的儒家经典全部刻在上面,作为校正经书的标准本,颁行天下,为天下学子的教科书范本。

由汉至唐主要是个诠释经典的时代,注疏之学盛极一时。且不论熹平石经后遭人篡改,即便它一直以来起到了标准本的作用,也无法阻挡义疏之学由于时间推移和门户之见所产生的章句繁杂、师

①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5~1706页。

②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94页。

说众多的趋势。因而，唐初颜师古考定《五经》之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学混乱的问题。南北所崇尚的经注版本并不相同，而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的政权对此都鲜有干涉，学者谁主谁从，悉听尊便。这在分裂时期尚无大碍，可是唐代已经是一个统一的王朝了，从隋代开始实行的科举考试在唐代继续沿用，如若对儒学注疏没有统一的版本，势必让人才的选拔无所依从，影响就非同一般了。于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①，试图吸取正统经学和玄学，整理出一套统一的经义。

贞观九年(635年)，《五经正义》被定为全国学校的教科书及科举考试的出题范本。皮锡瑞云：“自《经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②天下学子的思想至此趋向一致。

(二) 主编孔颖达一统南北的学术魅力

孔颖达(574—648年)，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他在经学上最高的成就就是主持编撰了《五经正义》。与其说是唐太宗选择孔颖达为编撰之业，毋宁说是《五经正义》选择了孔颖达。孔颖达的经学造诣和文化修养让他成为编撰以追求统一为编辑思想的《五经正义》的不二人选。

孔颖达出生于一个地位显赫、声名隆盛的书香仕宦之家，却无半点膏粱世胄的不良习气。他幼年时期生活的北周，政教清明，局势稳定，有儒雅重文之风，为他耳濡目染儒家文化提供了方便。少年时代的孔颖达便明悉了服虔所注《左氏传》，郑玄所注《尚书》、《礼记》及所笺《毛诗》，王弼所注《周易》；于儒经之外，还旁及诸子，兼善历算之学；更长于属文。后又师从大儒刘焯，《左传》于服注外又通杜预《集解》，《尚书》于郑注外再通《孔安国传》(即伪孔传)，也成为了一位南北通儒。而这正是编撰《五经正义》所必需的学术功底。而“二刘”在经学上融通南北的见识也必定深深地影

① 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41页。

②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7页。

响着孔颖达,让他有着兼容南北的视野和胸襟。

隋炀帝时,大兴儒学,“征辟儒生,远近毕至”^①。孔颖达迅速秀出诸儒生之间,应举明经,对策高第,授任河内郡学博士。大业年间,隋炀帝广征天下宿儒,集中于洛阳,由门下省主持,仿当年汉宣帝石渠议经、汉章帝白虎论礼之故事,举行大规模的儒学讨论大会。孔颖达在会上舌战群儒,被评为翘楚,受任太学助教,成为隋代儒学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武德四年十月(621年),孔颖达在秦王李世民的文学馆中被尊为“十八学士”之一,颇受亲近。及至李世民登基,孔颖达擢授国子博士,屡迁国子司业、祭酒,掌管一国教育,并与于志宁一道同为太子师,被李世民赞为“关西孔子”,备受恩赏。正是他在儒学上的造诣让他得以领衔《五经正义》的编撰。

据史载,参与《五经正义》编撰的除了孔颖达外,还有不少博学鸿儒。修《周易正义》的有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琰、于志宁等;修《尚书正义》的有王德昭、李子云等;修《毛诗正义》的有王德昭、齐威等;修《礼记正义》的有朱子奢、李善信、贾公彦、柳士宣、张权等;修《春秋正义》的有谷那律、杨士勋、朱长才等。这些都是当时顶尖的儒学人才,不少还是皇帝身边的重臣。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听从孔颖达的安排,在其领导下竭忠尽力,短短一年的时间完成170卷数百万字的《五经正义》编撰工作,与孔颖达深孚众望、南北融通的学术魅力是分不开的。

(三)择优而定一尊的编选理念

《五经正义》编撰之时,各经注疏版本众多,在版本的选择上独尊一家则是追求统一的编辑思想的最直接表现。《五经正义》全书的编排方式是一致的,首先列出经文、注文,接着串讲经文大意,然后疏通注文,说明注文之所以然。那么,究竟尊谁为宗呢?按什么标准来评判各种版本的优劣从而决定取舍成为《五经正义》编撰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简单粗暴地以行政命令作为规范,让经学与政治都南并于北,或者简单地以编者的个人好尚、家学渊

^① 魏徵:《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7页。

源来取舍都不合适。孔颖达等人在具体考察各个版本的基础上，定下了择优而定一尊的编选理念。

在注本的选择上，《周易》注到了南北朝时期只有郑玄、王弼两家。郑氏讲爻辰象数，王氏详玄学义理，相比之下，王注义例明备，“独冠古今”，故《易》用王注。《书》南北朝本多尊郑注，而后《尚书孔安国传》出，时人不知其伪，大行于南朝，孔颖达从刘焯传孔义，认为“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①，遂定伪孔传为主臬。这是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最大的败笔，深为后世所诟病，但从其出发点来说，确实认为孔传非常优秀。而当时的人也一并尊孔传，我们不能以今人之见来苛求古人。《诗经》唯《毛诗郑笺》独行于世，定为尊者，当无异议。《礼》本有《仪礼》、《周礼》、《礼记》三经之别，但是《仪礼》、《周礼》为制度仪文，缺乏义理，亦少文采，《礼记》则事文、义理兼具，因此三礼之中独取《礼记》，注用郑玄。《春秋》以《左传》为尊是多年传统，孔颖达认为唯西晋杜预《集解》，“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尊经重本，“子应乎母，以胶投漆”^②。另外，杜氏为《左传》总结有“五十凡例”，补充了左氏在三传中义理贫乏之不足，于各家传注中见解最高，体例最善。

这种择优而定一尊的思想并不拘泥于现成的版本，这里的“尊”也可以是经过编者融会贯通，择优而成的作品。“南北朝时期，儒生依照佛教讲疏的形式，对五经作有多种义疏，孔颖达对各家义疏进行比较，选择优秀底本，再融会众说、剪裁诸家，折衷以己意。”^③《周易》在江南有义疏十余家，但都“辞尚虚玄，义多浮诞”^④，于是孔颖达取其既合乎孔子思想，又与王弼注并行不悖的

① 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0页。

② 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98页。

③ 舒大刚主编：《中国历代大儒》，吉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151页。

④ 孔颖达等：《周易正义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页。

说法,编为正义。《尚书》有蔡大宝、巢猗、费昶、顾彪、刘炫、刘焯《正义》,前面数人多互相因循,义理浅略,唯“二刘”“最为详雅”^①。遂依“二刘”书疏为本,而删其狂傲和虚华。《诗经》义疏有全缓、何胤、舒援、刘轨思、刘丑、刘焯、刘炫诸家,他认为“二刘”其人“聪颖特达,文而又儒,擢秀干于一时,骋绝轡于千里,固诸儒之所揖让”,其疏“特为殊绝”,于是“据以为本”^②,而匡其轻狂,补其疏略。《礼记》疏有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思、沈重宜、皇侃、徐遵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家,其中皇氏最优秀,孔颖达乃“据皇氏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正”^③。《春秋左传》义疏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等家,孔颖达认为:“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④,故依据刘疏,补以沈氏,若两家俱失,则申以己见。

表 4-1

《五经正义》材料来源

	注	义疏
尚书正义	孔安国	刘炫及刘焯
春秋正义	杜预	刘炫
毛诗正义	郑玄	刘炫及刘焯
礼记正义	郑玄	皇侃
周易正义	王弼	北学

《五经正义》材料来源(见表 4-1)中只有《周易正义》采用的义

① 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10 页。

② 孔颖达等:《毛诗正义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61 页。

③ 孔颖达等:《礼记正义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223 页。

④ 孔颖达等:《春秋左传正义序》,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1699 页。